

试论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文化领导权

龙佳解 陈阳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省, 长沙市, 410000)

摘要: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上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一理论的文化领导权又是其中的核心思想,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本文通过对市民社会思想源流的梳理, 阐述其文化领导权的基本内涵, 揭示了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葛兰西; 市民社会; 文化领导权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 以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著称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 在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以后, 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地位得到了研究界的共识。但是从国内研究资料来看, 对于葛兰西哲学思想的研究, 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展开。国内的葛兰西研究, 除了毛韵泽先生的《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求是出版社1987年版)这本专著和仰海峰先生的《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外, 其他的只是一些非专题性的论文。毛韵泽先生的书, 更多侧重于对葛兰西生平的介绍, 而且主要是从共产国际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来讨论葛兰西的, 因此对葛兰西的哲学思想并没有深入研究。仰海峰先生的书则是试图从整体上透视葛兰西的哲学。本文尝试通过从葛兰西哲学中独创的市民社会及其文化领导权的视角下, 来讨论在现代社会中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与新科技革命的强劲推动下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 这些国家又利用其提早进入工业化乃至信息化社会的巨大优势, 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全面的文化渗透。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自身肩负的改革与现代化的重任之下, 面临着如何有效捍卫本国文化安全, 能动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行不断开拓道路的历史性课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由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最早明确加以阐述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所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

(一) 黑格尔之前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存在。“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 首先提出了“市民社会 (political society / community)”的概念。该概念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 具体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1]76}。它主要指的是个人作为公民必须服从国家, 市民社会包含在国家概念之中。这个概念一直沿用很久, 也可以说, 在其最初的含义上, 市民社会是等同于国家的, 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18世纪中期开始,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轻微的变化。社会契约论者掀起了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 “市民社会”也再次被学者所重视。在契约论者那里, “市民社会”是作为“自然状

态”相对的概念存在的。契约论者认为，自然状态存在自身无法调和的矛盾，而要克服这些矛盾的途径就是让人们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自愿让出自己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给国家，从而过渡到政治社会，也就是市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等关系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还是在很小的方面，基本上“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几乎还是等同于政治国家或政治社会。

（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第一次将国家和市民社会彻底区分开的哲学家是黑格尔。他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反对将“政治国家”等同于“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西欧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组织状态，是每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是政治国家生活之外的所有经济和社会过程。在市民社会中，各个成员都有其利益特殊性，即“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2]197}，但是，具有各自特殊性的市民社会成员之间又是相互依赖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明确指出市民社会不同于政治国家。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中，主要包括需要与劳动体系、司法、警察与同业工会。黑格尔认为真正的伦理是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统一，是理念的本身的存在，而国家是这个理念的表现。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区分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自由的实现，因此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二者之间关系的厘定中，黑格尔反对契约论者将国家视为大家的抽象的共同意志，如果按契约论者的观点，国家就是单个人的利益的结合，这就把国家的使命定义为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黑格尔认为这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理解国家的理论。影响黑格尔对待契约论者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原因主要是法国大革命活动中关于人们每个人的对待自由的态度上。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自由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每个人都拥有充分自由的严重后果，因此他认为必须防止自由的抽象化。黑格尔虽然分析出了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但是他认为当国家以有组织的方式调整市民社会的运行，并通过伦理观念实现对市民社会进行教育时，就可以把这种矛盾解决。这里，黑格尔就作出了国家的两种职能：一是管理上的调整功能，二是伦理教育的功能。

（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解却是和黑格尔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观点截然相反。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马克思则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已经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显然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130—132}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

市民社会是作为经济基础的范畴出现的,指全部物质关系,全部的工商业生活。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特征是一切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但是他并不是把市民社会等同于物质交换关系。实际上,他认为市民社会涵盖了整个私人利益的领域。“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马克思把政治国家之外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内容,而且马克思还立足于现实的物质交往关系,阐述了市民社会在整个社会中,尤其是对于国家的基础性地位。

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葛兰西的国家和市民社会思想主要来自于黑格尔、马克思等有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思想,他更侧重于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维度。前面我们谈到,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与国家都属于精神伦理领域,国家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理想,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在上层建筑这一领域内实现的。葛兰西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同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的,葛兰西又对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点进行改造,认为市民社会是除了国家之外包括其他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存在。有的人通过三者之间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对比,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更趋向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概念。

(一) 市民社会的概念

虽然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概念不同,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葛兰西是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扩大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围,而且也没有违背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根本性规定。所以葛兰西并不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直接发展,而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认为:“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32}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明确地把“市民社会”放到经济基础的范畴之中,葛兰西则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论范围。葛兰西发展了现代市民社会概念中的文化维度,并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在新的基础上层建筑上统一起来。他说:“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通知’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5]7}从上面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认为政治社会代表暴力,作为专政的工具,它的作用是用来控制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与当时的经济关系保持一致,它们的执行机构是法庭、监狱、军队等;市民社会则代表社会舆论,它通过民间的社会组织起作用,在这些组织中,最主要的是政党、公会、教会和学校,还包括各种意识形态——文化的组织,如报刊、杂志和各种学术文化团体等,总之,在葛兰

西那里，市民社会是除了国家以及国家机构之外的一切社会组织。

（二）市民社会的功能

1. 经济功能

在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的功能进行分析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经济功能。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是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基础发展而来的。他仍然遵循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规律。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作为经济基础起作用的，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则是包括除了国家以及国家机构之外的一切社会组织。我们可以说葛兰西市民社会充实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经济基础仍然是葛兰西市民社会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的经济功能是最基本的。这也是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中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功能。

2. 政治功能

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的第二个功能是其政治功能。它的政治功能最主要的体现是它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在传统哲学中，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是作为国家政治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存在的。葛兰西在认真分析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后得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市民社会已逐渐同化进国家整体之中。市民社会内部由于渗透进来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上层建筑因素，不再单纯地作为私人生活领域而存在。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因素，使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融合加强，对立消失。但是，葛兰西并未把市民社会的全部内容都划入国家范畴，而是将市民社会的某些成分划入其中。

3. 文化功能

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具有上层建筑的文化功能，这也是他最具特色的功能。文化功能主要指它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的领导权首先不是政治领导权，而是文化、意识的领导权。政治国家实际上已逐渐演变成为对文化、意识领导权的保护性机构。牢牢控制住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使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已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鉴于市民社会在现代国家中日益突显的地位和作用，统治阶级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对市民社会领域的控制。

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一）两种领导权

葛兰西在他的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领导权的理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5]38}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领导权：一是文化上的领导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权。这两种领导权分别对应着市民社会和国家，而且这两种领导权都掌握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手中。在不同的国家，必须要认清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地位，认清市民社会中起着堡垒作用的要素。“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

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5]194}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俄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不够完善，所以社会依靠的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政治领导权比文化领导权在国家生活中起的作用更大；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市民社会机构更为完善，单纯的政治领导已经不能控制整个社会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导权比政治领导权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能够在俄国首先得到胜利，而在西欧国家实行武装夺取政权而不能得到胜利的原因。这种情况下，葛兰西提出，在西方国家，掌握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是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的先决条件。

（二）文化领导权

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直接目标是先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逐步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然后无产阶级来掌握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进而掌握国家权力；而不是直接夺取国家领导权。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仍然要重视对市民社会的领导。

“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者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领导’；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5]38}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在文化领导权中起着重要作用。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些作为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中介的拥有一定特殊世界观和有意识的道德观的社会集团，他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中介。葛兰西提出了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要权力实行者的新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领导权，必须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即使革命成功了，仍然需要知识分子去巩固这种胜利。知识分子除了执行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外，还是社会领导当局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代表。在当时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这是由无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决定的，它没有体现自己对抗南方打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

在如何夺取文化领导权时，葛兰西提出了两种策略——“运动战”和“阵地战”。这两种作战方式又分为政治上的作战和文化上的作战。政治上的运动战就是对国家机器的直接进攻；阵地战则是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长期的进攻，这两种策略是相互依托的。运动战摧毁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最外层的防御体系，市民社会则是隐蔽在国家政权之后的最坚固的防御体系。“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体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作。”^{[5]191}因此在夺取政权之前行使的运动战必须转化为阵地战。这样才能更快更稳的建立自己的政权，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稳固的国家政权。葛兰西认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在市民社会里先发动阵地战，要在资产阶级意识领域内，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新世界观进行传播，然后瓦解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里形成的“堑壕”，建立自己的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市民社会体系。

可见，文化领导权的提出是对当时葛兰西所处的意大利社会现实加以分析，是根据国家和市民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制定的一个如何夺取政权的解决方案。但是，它在今天的无产阶级国家发展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意义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及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们发展国家和市民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理论意义

首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有指导作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对此比较重视，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根据欧洲革命的新形势提出必须重视教育、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其通过占有文化领导权，改造社会意识形态，最终获得政治领导权的理论，无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具体和深入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其次，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充实和发展，使我们意识到在思考社会结构的时候，不要依赖于社会历史中二元对立的矛盾的划分。在葛兰西那里，他不仅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他还认为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的规律时，必须要研究事物的具体结构，就像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决定和反作用的关系。市民社会对国家影响是通过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一起起作用的。特别是市民社会所具有的上层建筑的文化功能。发展完善或者较发达的市民社会是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堑壕”和坚固堡垒。因此在无产阶级统治社会的时候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这样才能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权。

（二）实践意义

首先葛兰西市民社会独特的功能，经济政治文化功能一体化，是在对当时社会和国家的具体分析之后提出的。它对欧洲社会以及世界各国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社会结构中的文化结构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机制。葛兰西对东西方各国国情不同的考察得出了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起的作用不同。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较发达的国家，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必须先掌握这个社会文化领导权。如果只是发动运动战，直接武装夺取政权，而不是先掌握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那么就算武装夺取政权能够取得成功，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在随后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方面跟不上也是不行的。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国家中，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例子。而在市民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武装夺取政权之后，仍要做好发展本阶级的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我国发生民主革命之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随后的社会生活建设中，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也不断巩固着我们建立的人民政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文化领导权是在政治领导权的控制下发展的，由于“左”的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建立了看似非常稳固的文化领导权，这样文化领导权不是建立于广大民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的。这绝不是建立真正文化领导权的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在保持文化的

多样性, 提倡文化多元化的同时, 也要警惕文化殖民主义。在我国的市民社会中, 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 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文化阵地, 同时提高广大民众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其次, 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巩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发展过程中, 包括广大学者、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精英阶层为我国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大力推进社会的知识分子化, 即发挥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的作用, 借助于教育等方式推进普通民众的知识分子化, 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 包括技术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 让每个人都投身于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

综上所述,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比较复杂, 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葛兰西反对第二国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 强调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革命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因为它突破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在这个基础上, 葛兰西强调了过去被忽视的文化上层建筑的社会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葛兰西的伟大贡献: 不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坚决反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 以及必须重视文化层面的作用。“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发展也就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 [1] 何增科. 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2]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范扬、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5] [意] 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曹雷雨、姜丽、张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7] 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8] 仰海峰. 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9] [意] 葛兰西. 葛兰西文选 [M], 李鹏程编,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10] [德] 亨利希·库诺. 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 [M], 袁志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

On Gramsci'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Longjiajie Chenyang

(Marx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410000)

Abstract: The civil society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ramsci,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Leadership which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s the key

ideas of the civil society theory and elaborate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Leadership,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meaning of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Keywords: Gramsci; civil society; cultural leadership

作者简介: 龙佳解, 男, 1953年2月出生, 湖南常德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湖南省高校哲学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